

1860年代德意志 「福爾摩沙殖民論」再商榷*

謝宜甄**

摘要

1860年代發生在「德國」境內的「殖民福爾摩沙」討論及境外的「大南澳事件」，使德國在臺灣涉外關係研究中成為十九世紀對臺灣有所意圖的列強之一。然而，彼時的德國仍在積極推動帝國統一，在東亞的商貿與政治布局也甚淺，為何會突然關注到遙遠的福爾摩沙、欲佔領一個缺乏良港的島嶼作為德意志遠東海軍基地——這是以傳統馬克思帝國主義發展理論作為研究框架的相關先行研究未曾真正回答的問題。

本文透過分析1860年代「殖民福爾摩沙」輿論的相關著作與其生成背景，以社會史和知識史的角度切入，嘗試與臺灣涉外關係史的先行研究對話，主張1860年代無論是曾經來臺的普魯士特遣艦隊（*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或普魯士與德意志關稅

* 本文改寫自碩士論文《德意志與臺灣的交涉：近代德語世界臺灣知識的形成（1828-1898）》第三章部分內容，撰寫期間感謝林文凱老師的指導，以及口試委員林欣宜老師、陳偉智老師的提點與指教。

現今德國的概念成立於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帝國之時，在此之前「德國」是一個邦國林立、人們能說寫德意志語（Deutsch）的地區；在諸邦國之上雖有拿破崙戰後成立的德意志邦聯（der Deutsche Bund），但實際上的政治影響力薄弱。為避免混淆當代與1860年代變動中的德國，本文以引號標註後者的特殊性，並以「德意志人」稱呼1860年代的德國人、以「德意志地區」稱呼德意志邦聯涵蓋的地理範圍。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同盟官方，均沒有殖民臺灣的明確意圖與實際作為，因為對當時的德意志邦國而言（尤其是普魯士與奧地利），德意志地區內部的統合遠比占領太平洋上的遙遠島嶼來得重要。至於先行研究所言「德國對臺灣的覬覦」，真正的行動者其實是部分普魯士擴張主義者，他們認為在當時普奧兩強對峙的情況下，普魯士可藉由取得海外殖民地鞏固在德意志地區的領導地位，進而看上臺灣。

關鍵詞：德國、帝國主義、臺灣涉外關係、普魯士東亞特遣艦隊

一、前言

1865 年至 1867 年，柏林的輿論圈開始討論起遠在太平洋的小島福爾摩沙，建議普魯士殖民該島，將其作為德意志海軍的遠東基地。支持者認為福爾摩沙擁有作為殖民地的優秀條件：氣候宜人、物產豐饒、礦藏豐富，最重要的是港口眾多，除了已知的基隆、淡水、安平、打狗之外，仍有許多未知的口岸尚待發現。¹反對者則認為福爾摩沙缺乏良港、氣候不適合歐洲移民居住，且佔領該島將耗費普魯士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與金錢，亦可能因此與大清帝國爆發衝突，影響德商在華的商業利益。²

在差不多的時間點上，1868 年，葛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服務的漢堡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偕同英人荷恩（James Horn）前往噶瑪蘭廳，向當地原住民承租土地興建房舍，並招募大量工匠與壯勇，開始在大南澳地區私自伐樟製腦，以此賺取高額利潤。噶瑪蘭廳通判發現美利士與荷恩私墾大南澳的計畫後，通報英國駐臺領事，甚至上呈到英、普兩國的駐京公使，在一連串外交斡旋後才成功使美利士與荷恩撤出大南澳地區。

1860 年代後半發生於「德國」境內外的殖民福爾摩沙討論與大南澳事件，長久以來在臺灣涉外關係史中被視為十九世紀「德國」覬覦臺灣的證據，使當時尚未完成統一大業的「德國」躋身清末對臺抱有野心的西方列強之林。

關於「德國」對臺野心論述的發展，最早提出的是 1897 年李斯（Ludwig Riess, 1861-1928）的《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1898 年歷史及語言學者魏特（Albrecht Wirth, 1866-1936）的《1898 年以前的福爾摩沙歷史》（*Geschichte Formosa's bis*

¹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Albert Eichhoff, 1867), pp. 8-62.

²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es und seiner Folgen*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897), pp. 141-145.

Anfang 1898）。兩人提到1859年普魯士聯合德意志關稅同盟邦國組成特遣艦隊，前往東亞與大清帝國、日本、暹羅簽訂通商條約，其中，船隻「易北河號」（*Elbe*）在執行任務時，曾為了躲避颱風而短暫停泊於臺灣西南海岸，並與當地原住民發生衝突。此外，兩人也公開了柏林學者恩斯特·弗立德（Ernst Friedel, 1837-1918）1867年鼓吹殖民殖民福爾摩沙的著作《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建立普魯士——德意志殖民地——以東亞為中心》（*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提到以此書為代表，1860年代後半德語輿論圈曾熱烈討論殖民福爾摩沙。³

約半世紀後，1958年，前東德歷史學者史托克（Helmuth Stoecker, 1920-1994）在其著作《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中，延續李斯與魏特的敘述，進一步利用外交檔案指出，在普魯士特遣艦隊的領隊艾倫波（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Eulenburg, 1815-1881）前往東亞前，曾獲得密令，要求他在太平洋或南美洲尋找適合的殖民地，必要時可留下一艘船和士兵；⁴而在艾倫波啟程前，法國也曾向他建議可佔領臺灣作為要脅清廷談判的籌碼。⁵此外，史托克亦利用書信、檔案、回憶錄，指出在普魯士特遣艦隊返國後，有駐華的普魯士外交人員仍持續研究佔領臺灣的議題。⁶史托克以外交檔案強化了李斯與魏特的論述，透過官方檔案呈現出1860年代殖民福爾摩沙的議題，似乎不只是民間的輿論發酵，官方也有所作為。而最終為何沒有化為具體行動，史托克則引用他

³ 李斯（Ludwig Riess）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278-280、頁288-290；Albrecht Wirth, *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 (Bonn: Carl Geogri, Universität-Buchdruckerei, 1898), pp. 123-126.

⁴ 轉引自史托克（Helmuth Stoecker）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頁328-329。

⁵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61。

⁶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78-81。

人著作指出，雖然普魯士海軍部希望佔領臺灣，但因普魯士政府忙於統一大業而無法實現。⁷

之後研究中／臺德關係的學者李國祁、⁸漢堡大學漢學系教授艾波施坦因（Bernd Eberstein）、⁹余文堂、¹⁰黃順進等人在探討1860年代「德國」對福爾摩沙的野心時，¹¹也大致遵循史托克的見解。其中，余文堂認為早在1860年代之前，德意志人已透過報章雜誌與書籍對臺灣有所了解，所以對臺的覬覦早已開始，而普魯士特遣艦隊船隻與船員在執行遠東任務期間之所以來臺，是為了調查臺灣進而將其闢為殖民地。¹²此外，余氏也以1868年至1869年間漢堡領事美利士聯合英人荷恩私墾大南澳事件作為「德國」覬覦資源豐富的臺灣的證據。¹³而同樣研究大南澳事件的黃進順則以事件發生後普魯士駐京公使消極的處理態度，論證當時普魯士因忙於德意志帝國統一大業，放棄佔領臺灣的意圖。¹⁴

然而，繼承史托克論述、認為十九世紀德國曾覬覦福爾摩沙的學者們並未注意到，史托克的研究框架其實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頗深。他在著作中開宗明義提到研究十九世紀中德關係的動機之一，是因為注意到1950年代帝國主義在德國捲土重來，「因而研究、敘述德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過去參加對經濟落後的、殖民地的、附屬國的人民的掠奪、剝削、奴役，就成為先進的德國歷史學的責任」。¹⁵而針對十九世紀後半全面對西方人開放

⁷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80。

⁸ 李國祁，〈三國干涉還遼後中德租借港灣的洽商與德璀琳（G. Detring）上德政府建議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臺北，1969.8），頁83。

⁹ Bernd Eberstein, *Preussen und China: Eine Geschichte schwieriger Beziehungen* (Berlin: Duncker & Humboldt, 2007), pp. 200-202.

¹⁰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國史館館刊》，58（臺北，2018.12），頁5-33。

¹¹ 黃順進，〈1860年代的德意志與臺灣：從覬覦臺灣到侵墾大南澳的探討〉，《宜蘭文獻》，110（宜蘭，2017.6），頁4-55。

¹²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11-30。

¹³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41。

¹⁴ 黃順進，〈1860年代的德意志與臺灣：從覬覦臺灣到侵墾大南澳的探討〉，頁45-46。

¹⁵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1-2。

的中國社會，他則主張「除了地主、官僚等反動的封建階級的剝削以外，又加上外國資本家的掠奪，以致經濟的衰落和崩潰加甚」，¹⁶與當代晚清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差異甚遠。¹⁷由此來看，依據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史托克及其後學者，先將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形成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向外開拓市場、佔領殖民地視為必然，致物產豐饒、蘊含煤礦、地理位置優良的福爾摩沙島被十九世紀中葉經濟蓬勃發展的「德國」相中，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事。

然而，馬克思主義史觀的「經濟決定論」敘事框架無法回答，相較同樣在德國官方檔案中提及的其他島嶼——如舟山群島、婆羅洲、巴塔哥尼亞——福爾摩沙對「德國」來說究竟有何特別之處？¹⁸又，在德意志帝國於1897年佔領膠州灣之前，德語世界在東亞的商業及政治勢力仍遠不及耕耘許久的英、法等國，因此對臺灣的認識也相對較少，那是基於怎樣的認知，會讓「德國」如先行研究所言，花費許多時間與精力研究、討論殖民福爾摩沙的可能性？

此外，在先行研究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參與殖民福爾摩沙議題的人物甚多，包含普魯士海軍部官員、參與遠征的船員與學者、普魯士駐外領事館人員、普魯士籍學者……等。若僅以經濟層面切入，將嘗試拓展海外貿易的「德國」對福爾摩沙的覬覦視為理所當然，則無法回到歷史現場看見每個人物對此議題的實質影響力其實大不相同，不應將每個曾談論、研究過此議題的德意志人皆視為「德國」推動殖民福爾摩沙計畫的事證。例如，史托克雖指出普魯士駐上海領事館人員曾研究殖民福爾摩沙的議題，但並未說明這是誰指派的任務，研究成果如何、後續呈報到

¹⁶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30。

¹⁷ 例如研究臺灣開港後經濟活動的經典著作《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即指出臺灣生產的茶、糖、樟腦等國際商品在開港後成為主要出口品，促進了臺灣的經濟發展，也帶動本土資產階級崛起。參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¹⁸ 在史托克整理的檔案中，這些地方都曾經有人建議。參見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78-97。

哪個層級或是束之高閣亦不明。¹⁹而史托克雖指出普魯士海軍部及海軍將領阿達貝爾特親王（Prinz Heinrich Wilhelm Adalbert von Preußen, 1811-1873）曾將臺灣及巴塔哥尼亞列為殖民候選地，卻未說明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普魯士議會等其他中央部會對此議題的看法，無法明確看出「殖民福爾摩沙」議題在普魯士中央的重視程度。而事實上，在1890年俾斯麥去職之前，德意志帝國的外交策略始終重視「歐洲戰場」遠勝海外殖民地，因為對俾斯麥而言，如何讓普法戰爭後成立的帝國在法國、奧地利、俄國的潛在威脅下存活下去，才是首要之務。²⁰

先行研究因受馬克思主義史觀的敘事框架所影響，將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對美麗之島殖民的野心視為理所當然，而無法細緻的看見十九世紀中葉德語世界對臺灣知識的掌握度、普魯士特遣艦隊來臺的實際原因與背景，以及1865年「殖民福爾摩沙」輿論的實質內涵……等問題，導致透過檔案的片段誤解了1860年代德意志「福爾摩沙殖民論」。而事實上，清、德的密切互動於1870年代後半才開始，因為駐京公使巴蘭德（Max von Brandt, 1835-1920）和海關職員德璀璨（Gustav von Detring, 1842-1913）積極推動雙方的軍事合作。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下，清德早期互動的官方檔案較少，史托克對此雖已完整掌握，²¹但若要回答上述問題，則需跳脫檔案，以社會史、知識史的角度重新檢視被視為「德國覬覦福爾摩沙」證據的回憶錄與著作，探究其內容與生成脈絡，才能更細緻的理解1860年代臺灣與「德國」交會的歷史細節，並釐清德意志「福爾摩沙殖民論」的歷史意義。

¹⁹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80；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39。

²⁰ 黃福得，〈1918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5（臺北，2006.5），頁119-123。

²¹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1-5。

二、普魯士東亞特遣艦隊

1840 年代鴉片戰爭後，德意志學者和商人注意到廣大的中國市場帶來的商機，且已有少數德商至通商口岸開設洋行，例如在廣州的德商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禪臣」洋行（Siemssen & Co.）、「普斯陶公司」（Wm. Pustau & Co.）等。²²然而此時德意志關稅同盟官方對中國市場持保留態度，直到 1858 年英、法與大清帝國簽訂《天津條約》，開放更多通商口岸、領事裁判權，並允許外國人進入內地後，德意志關稅同盟才意識到忽視遠東利益可能會造成的經濟損失。與此同時，在大清帝國境內蔓延的太平天國之亂也使在華德商的身家財產遭受威脅。為了不在遠東貿易落於人後，也為了保障德商在遠東貿易的權益，德意志關稅同盟決定由普魯士主導、聯合同盟邦國組成東亞特遣艦隊，繞過非洲大陸經印度洋抵達亞洲，和日本、大清帝國、暹羅簽訂通商條約。此舉除了關乎遠東經濟利益之外，另一方面也是經濟與政治實力增長中的普魯士，欲藉此行與奧地利競逐「德意志」的外交代表權。²³

普魯士特遣艦隊在亞洲期間，船隻「易北河號」、「忒提斯號」（*Thetis*）、地質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農業學者赫爾曼·馬洪（Hermann Maron, 1820-1882）先後來到臺灣，留下描寫福爾摩沙的學術著作與回憶錄，這些著作則被後來的學者視為「德國」對臺野心的證據，認為在普魯士特遣艦隊來臺時便對島嶼有所意圖。然而若將這些著作放回這些船隻

²² 余文堂，〈鴉片戰爭後的中德貿易（1842-1860）〉，《興大歷史學報》，2（臺中，1992.3），頁 83-120。

²³ 關於 1840-1960 年代德意志關稅同盟對遠東局勢的關注可參見 Horst Grün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 (Paderborn; München; Wien; Zürich: Schöningh, 1985), pp. 97-98。此外，從軍事史的角度來看，遠征艦隊此行對普魯士來說也別具意義。雖然船艦嚴重毀損，但普魯士仍因此獲得一批擁有實戰經驗的船員，且透過自行打造的「船堅炮利」勝過奧地利，成為德意志遠東地區的外交代表，參見勞倫斯·桑德豪斯（Lawrence Sondhaus）著，NAVAL+譯，《德國海軍的崛起：走向海上霸權》（北京：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2013），頁 62-63。

與人員來臺的歷史現場，應可更細緻的思考普魯士特遣艦隊是否如先行研究所言，已展現「德國」對福爾摩沙的野心。

（一）「易北河號」的福爾摩沙插曲

1860年11月，補給船「易北河號」從香港出發前往長崎，與提早抵達日本的其他特遣艦隊船隻會合。為了乘著黑潮航向日本，「易北河號」的航行路線自中國東南沿海穿越臺灣海峽，繞經臺灣南岬後，沿著東部海岸北上。在行經臺灣西南海域時，

「易北河號」為了躲避風浪暫時停泊於該處海岸，並於短暫停泊期間遭遇當地原住民襲擊；雖然無人傷亡，但船長維納（Reinhold Werner, 1825-1909）仍砲擊岸邊的原住民部落作為報復。²⁴維納船長在結束此次遠征後，於1863年出版了回憶錄《1860、1861、1862年普魯士特遣艦隊航向中國、日本、暹羅之旅——海軍軍官萊茵霍爾德·維納的旅行信件》（*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在回憶錄中用了完整一章的篇幅描寫臺灣，包含他在西南海岸的奇遇與對東部海岸的觀察，²⁵而在章節的最後維納船長提到：「如果我們可以無償取得這座島嶼的話，一個豐饒而且富含煤礦與貴金屬的殖民地是不容小覷的！」²⁶

余文堂在〈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中將此次「易北河號」與臺灣西南海岸原住民的衝突，

²⁴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63), pp. 2-8.

²⁵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pp. 2-16.

²⁶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p. 16. 原文為“Eine Colonie von einigen hundert Quadratmeilen des fruchtbarsten Landes mit Kohlen und Metallschätzen dürfte für uns nicht zu verachten sein, wenn wir sie umsonst bekommen können!”

視為普魯士對取得臺灣作為殖民地的覬覦之舉。²⁷然而，若仔細觀察「易北河號」的航行途徑——自香港穿越臺灣海峽、繞經臺南岬之後順著黑潮北上日本——其實是非常普遍的航海路線，1850年代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及美國海軍艦隊前往日本、在東亞海域一帶航行的時候便遵循此路徑，²⁸因此「易北河號」並非帶著意圖刻意前往臺灣，僅是在穿越臺灣海峽遭風、避浪時，恰好與停泊處的原住民發生衝突而已；而這類因洋船停泊或擋淺進而與沿岸原住民發生衝突的事件亦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便屢見不鮮。²⁹

此外，維納船長雖在回憶錄中以大篇幅描寫福爾摩沙，並留下呼籲普魯士佔領福爾摩沙的話語，但他對於島嶼的親身了解，其實僅只遭遇西南海岸原住民的那一夜，以及船隻行經東部海岸時從遠處所見的山景，往後「易北河號」不曾再靠岸臺灣。因此他的回憶錄中大篇幅關於臺灣歷史、族群、產業、西部口岸等描寫，必須仰賴他人舊作寫成，例如他在回憶錄中大篇幅描寫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臺灣西部的歷史，從荷蘭人為了與明帝國貿易而佔領福爾摩沙，到最後被明鄭軍隊攻陷城池。³⁰而維納船長之所以可以詳盡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十七世紀曾有多部著作曾描寫「大員商館」陷落的過程，包含1663年的《荷蘭信使》（*Hollandtsche Mercurius*）、166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士兵赫伯特（Albrecht Herport, 1641-1730）的《東印度旅行短記》（*Eine kurtze*

²⁷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20-24。

²⁸ 參見Alexander Wylly Habershon, *The North Pacific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expedition; or, my last cruise. Where we went and what we saw: being and account of visits to the Malay and Loo-Choo Islands, the coasts of China, Formosa, Japan, Kamtschatka, Siberia, and the mouth of the Amoor River*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London: Trübner & Co., 1857), pp. 159-179.

²⁹ 參見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頁135-139。

³⁰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pp. 13-16.

Ost-Indianische Reiß-Beschreibung）、1670年的《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中國記》（*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167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的《被遺誤的福爾摩沙》（'t Verwaerloosde Formosa）……等自十七世紀起，持續傳抄（刊行）至十九世紀的著作。³¹又例如，維納船長提到臺灣的山蘊含了貴金屬與煤礦——福爾摩沙的煤礦至1860年代時已廣為人知，³²但在尚未有西方人挖掘出貴金屬礦物的情況下，為何維納船長仍提到臺灣蘊含貴金屬？其實是早在十八世紀法國傳教士馮秉正（J. F. M. A.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奉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之命來臺測繪地圖時，其書信內便已提到臺灣的東部山區可能蘊含金礦。³³他的書信被收錄於《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早在十八世紀翻譯為德文，至十九世紀仍然廣為流傳。³⁴

此外，相較於臺灣的米、糖、樟腦等有名的出口品，維納船長用了整整一段的篇幅描寫了「蓮草」，³⁵簡介其生長與用於製成「米紙」（rice paper）的過程。³⁶蓮草作為較少被來臺西方旅人關

³¹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2006），頁150-225。

³²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p. 10.

³³ 參見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文獻專刊》，1：1（臺北，1949.8），頁42。

³⁴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頁266。

³⁵ 蓮草俗名 Ricepaper，可用於製紙，品質潔白透亮，因而得此名稱。蓮草在1830年代就受到英國的植物學家關注，並致力於取得活體標本進行研究。蓮草的生長地除了華南一帶還包含臺灣，1850年代植物獵人福鈞（Robert Fortune）來臺時便曾採集蓮草寄回英國。1850年代擔任香港總督的包令（John Bowring）也曾協助英國皇家植物園採集蓮草標本，留下書信也有公開發表的研究。關於蓮草的研究史可參見劉湘瑤、王國雄，〈以蓮草發現史看博物學的探究歷程與知識發展特性〉，《科學教育月刊》，382（臺北，2015.9），頁19-31。

³⁶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p. 10.

注的出口品，且與維納船長此行毫無關聯，卻能被相對詳盡地描寫；雖然維納船長並未直接引註出處，但我們可以從與 1850 年代初期、協助採集蓮草標本的香港總督包令（John Bowring, 1792-1872）之子的報告中比對得知，維納船長對蓮草的描述應是出於包令的調查報告。³⁷

從上述的許多例子可以發現，維納船長對臺灣的認識加深應於他返國寫作回憶錄之時，而佔領福爾摩沙的呼籲也遠在普魯士特遣艦隊東來之後，因此此呼籲應是維納船長個人的意見，而非普魯士特遣艦隊對臺之企圖。

（二）李希霍芬短暫的淡水調查

1861 年 1 月，普魯士特遣艦隊在與日本簽訂貿易協定後，於 3 月抵達上海，和清廷展開為期半年的條約談判過程。³⁸談判期間，艾倫波派遣「忒提斯號」南下馬尼拉、婆羅洲、新加坡、爪哇等地進行科學調查，參與此次任務的有科學家及關稅同盟的商業代表。³⁹

此次調查任務中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地質學者、日後的德意志中國通李希霍芬。他於 3 月 27 日搭乘「忒提斯號」離開上海，南下的第一站為香港，接著於 4 月 3 日上午抵達淡水，短暫停留後於下午 3 點離去。⁴⁰停靠淡水期間，他記錄所見的河口地形，也調查了河岸附近的地質，非常仔細地記錄下了岩層的成分（凝灰岩、

³⁷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p. 10.

³⁸ J. C. Bowring, “The Rice-Paper Plant of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art III 1851-52(1853), pp. 28-33.

³⁹ Anonymou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Band 3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1873), p. 375.

⁴⁰ Anonymou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Band 3, pp. 375-376.

⁴¹ Karl Eduard von Marten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Zoologischer Teil*, Band 1, Allgemeines und Wirbelthiere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1876), p. 162.

礫岩、碎石、角礫岩等）、不同岩層形成的年代、岩石的顏色、組成方式，並繪製了一張岩層剖面圖。⁴¹在「忒提斯號」離開臺灣、抵達香港後，他將對淡水河岸地質調查的結果即時寄給了遠在柏林的《德意志地理學會期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geologischen Gesellschaft*）編輯，被收錄於1860年份的《德意志地理學會期刊》。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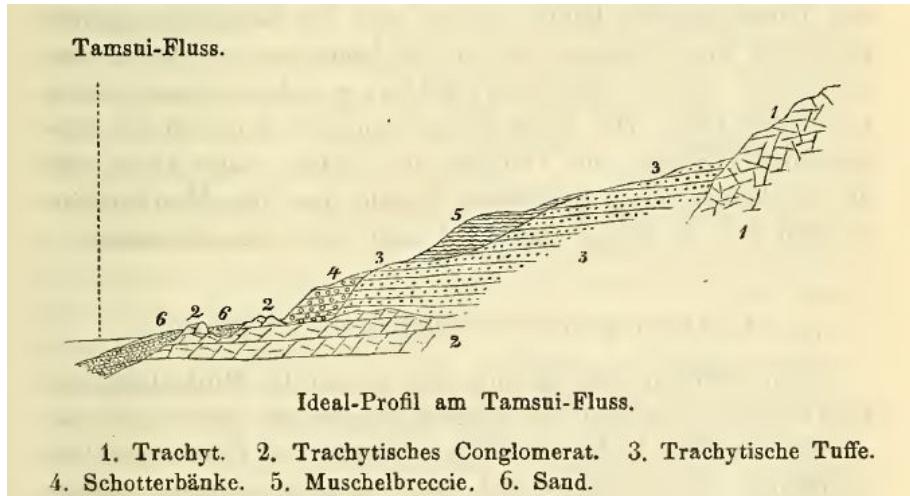


圖1 淡水地層分布（李希霍芬繪製）

說明：此圖為李希霍芬所繪製的淡水地層，編號1至6分別為粗面岩、粗面礫岩、粗面凝灰岩、碎石層、有貝殼的角礫岩、沙。本圖以彩色呈現，原貌請參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9期全文電子檔。

資料來源：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geologischen Gesellschaft*, 12: 4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1860), p. 539.

⁴¹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geologischen Gesellschaft*, 12: 4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1860), pp. 536-540.

⁴²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pp. 532-545. 此處引註的期刊年份雖然顯示1860年，但這本《德意志地理學會期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geologische Gesellschaft*）第12期其實編輯於1861年，收錄了1859年11月至1860年10月的研究著作。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61年4月離開臺灣後，即時將調查報告寄回德國，因此得以被收錄在當時正在編輯中的《德意志地理學會期刊》；在期刊中也可以看到編輯寫於1861年的編輯紀錄。

除了對淡水河口地形的描述及河岸附近的地質調查外，李希霍芬此份調查報告還包含了對雞籠煤礦及草山地區硫磺的介紹，而部分先行研究視李希霍芬此次臺灣踏查為殖民調查。戴天昭指出「德國」為了以臺灣為東亞勢力的立足點，派遣李希霍芬來臺考察淡水地質，並稱其著作為「研究臺灣地質的嚆矢」。⁴³余文堂則認為李希霍芬基於「德國」對雞籠煤礦的垂涎，來臺調查煤礦。⁴⁴然而，若仔細觀察李希霍芬的文章，將會發現他對雞籠煤礦以及北部山區硫磺的描寫均參考培理遠征艦隊在 1854 年對雞籠煤礦的調查報告，⁴⁵以及郇和 (Robert Swinhoe, 1836-1877) 1859 年刊登於《皇家亞洲學會北華分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福爾摩沙訪問記〉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寫成。⁴⁶例如，當李希霍芬介紹雞籠煤礦時，首先強調培理遠征艦隊調查的貢獻，指出長久以來皆傳聞臺灣北部有煤礦，但始終缺乏進一步的調查，直到培理派遣人員來臺才有所進展。⁴⁷關於雞籠煤礦的品質，他引用美國的調查指出臺灣的煤礦雖沒有英國的好，但已經比日

⁴³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完整版）》（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214、243。

⁴⁴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25-28。

⁴⁵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notes and journals of Commodore Perry and his officers, at his request, and under his supervision*, vol. 1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pp. 499-500; Anonymou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with illustration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pp. 153-163.

⁴⁶ Robert Swinhoe,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2 (May, 1859), pp. 145-164.

⁴⁷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p. 541. 原文為“Man hatte seit langer Zeit unbestimmte Nachrichten über das Vorkommen von fossilem Brennstoff im nördlichsten Theil von Formosa.....PERRY gab der Macedonian bestimmte Instructionen in Betreff dieses Punktes und wir verdanken in Folge dessen Herrn JONES den ersten Bericht über das Vorkommen.”

本佳；煤炭燃燒快速，但並未留下太多灰燼。⁴⁸針對北部山區硫礦的描寫，李希霍芬則指出郇和著作的重要性，認為他可能是少數幾個調查過福爾摩沙北部硫礦的歐洲人。⁴⁹簡而言之，李希霍芬針對雞籠煤礦和北部山區硫礦的描寫，與同篇文章中對淡水河口地形、河岸地質的調查不同，並非親身的觀察結果。此外，若以郇和1858年來臺的行程為比較基準，⁵⁰在「忒提斯號」僅短暫停泊淡水港的幾個小時的前提下，李希霍芬亦不可能前往北部山區與雞籠踏查。

綜上所述，若將李希霍芬的著作放回他寫作當下的時空，他僅是搭乘「忒提斯號」南下時短暫停靠淡水，因而留下對福爾摩沙簡短的科學記載，並未如前人所言，為了殖民目的對臺灣北部的礦藏進行深入調查。另一方面，從「忒提斯號」停泊淡水的時間長度來看，臺灣並非普魯士特遣艦隊所關注的對象，隊長艾倫波所指示進行科學調查的重點，始終都是菲律賓等東南亞島嶼與海域，因此，不應將李希霍芬對北臺灣地質的調查視為「德國」對福爾摩沙野心的展現與實踐。

（三）赫爾曼·馬洪「脫隊」來臺

除了「忒提斯號」外，在德意志關稅同盟與清廷談判期間來到臺灣的還有特遣艦隊的農業學者赫爾曼·馬洪。1861年7月，他在上海透過熟識的英國船長，搭乘英商顛地洋行（Dent & Co.）的商船，趁著工作空檔來到臺灣，自打狗登陸上岸。⁵¹彼時，郇和正

⁴⁸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p. 542. 原文為“Nach Versuchen, welche Commodore PERRY anstellen liess, zeigte sich die Formosa-Kohle zwar nicht so gut als die ‘beste’ englische, die allein damit verglichen wurde, aber bedeutend besser als die japanische, was allerdings kein besonderes Lob ist. Sie verbrennt schnell, hinterlässt aber auffallend wenig Rückstand.”

⁴⁹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p. 543. 原文為“SWINHOE ist wahrscheinlich der einzige Europäer, welcher die Gruben besucht hat (1858); er fand sie verlassen, wiewohl sie noch kurz vorher stark bearbeitet wurden.”

⁵⁰ 參見Robert Swinhoe,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pp. 145-164.

⁵¹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在打狗準備至府城設立領事館的事宜，也打算在府城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深入島內各地探險，馬洪聞訊便去拜訪郇和，表示自己也想同行。⁵²

7月11日，馬洪跟著郇和的隊伍前往府城，途中，他將臺南的田園景色描寫得十分美麗：

帶有熱帶風情的甘蔗茂密成林、精緻的蓼藍（靛青）、瘦長的芝麻開出杯狀的白色花朵、花生的葉子是嫩綠色的，花朵開成一片黃色的花海，還有稻米跟小冠花，偶爾也會看到在植物界最甜美、最華麗的存在——蓮花。當風吹拂它的大圓葉子；當閃著水光的紅色蓮花倒向站得直挺挺、彷彿在觀察獵物的白色蓮花時，這個景象讓人彷彿置身童話般的美好。⁵³

他筆下的臺灣農作物也非常多元——當他們於休息棧暫歇片刻時，香蕉、鳳梨、芒果、西瓜、柚子等水果唾手可得。⁵⁴馬洪表示即使自己是一個農業學者，臺灣這塊富饒的土地仍然令他驚艷不已，植物的多樣性對研究者而言亦是一個珍貴的寶庫。⁵⁵然而，無論臺南的田園風光如何美好，都不能挽留馬洪在府城多待幾日，因為當他們一行人抵達府城、前去拜會道台時，眾多的圍觀百姓讓馬洪感到威脅，他甚至將群眾形容為「大聲叫囂的野蠻流氓」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Berlin: Otto Janke, 1863), pp. 2-19. 在臺灣尚未正式開港前，英商「顛地洋行」和「怡和洋行」便已派遣船隻定期來台貿易，因此此時馬洪所搭乘的便是這些洋行的定期商船；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到顛地洋行和怡和洋行早在開港前就已經私下來臺販運鴉片。參見達飛聲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頁213。

⁵²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p. 19-20, 27.

⁵³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p. 32-33.

⁵⁴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p. 33-34.

⁵⁵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 59.

(laute und rohe Pröbel)。⁵⁶因此，馬洪決定提前結束他的府城之旅，7月14日一早便自安平返回打狗，並於7月底返回上海。⁵⁷

馬洪是來臺的普魯士特遣艦隊成員中待在臺灣最久，活動範圍也最廣、最深入內陸的人，他在臺的見聞收錄於1863年出版的回憶錄《日本與中國：普魯士特遣艦隊遠征東亞期間的旅行素描》(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第二冊。⁵⁸針對馬洪的臺灣行，余文堂將其視為和李希霍芬一樣帶著殖民目的的考察任務。⁵⁹然而，如前所述，馬洪其實是趁著工作空檔自行「脫隊」前往臺灣旅遊，並非正式的調查任務，而馬洪對臺灣的紀錄也未收錄於普魯士官方出版的東亞遠征報告中，因此他的臺灣書寫僅是個人著作；章節內出現的「如果福爾摩沙屬於普魯士……」之語亦不宜上綱至「德國」或普魯士特遣艦隊對福爾摩沙的覬覦。⁶⁰

此外，須注意的是，馬洪之所以可以成為普魯士特遣艦隊成員中在臺活動範圍最廣、最深入的人，與前述「易北河號」的維納船長、「忒提斯號」的李希霍芬最關鍵的差別在於，他仰賴的是英國自1850年代以來在臺經營的貿易網絡，以及清英《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簽訂後，得以在臺設立的英國領事館、開放西方人進入臺灣內地旅行與傳教的條款，並非尚在與清廷談判幹

⁵⁶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 49.

⁵⁷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p. 58, 62.

⁵⁸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p. 1-62.

⁵⁹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27。

⁶⁰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 27. 該句原意為「如果福爾摩沙屬於普魯士，我們就能趕快釐清南部是否有硫礦。」

關於臺灣南部蘊含硫礦的說法，康熙年間的〈臺灣地里圖〉、乾隆年間的〈乾隆臺灣輿圖〉，以及鳳山的地方志中確實記載打狗港附近有「硫礦水」的河流名稱；然而依照近年的考證，該處泉水的硫礦味其實是海底生物與藻類植物沉積物產生的硫化氫味，並非真正的硫礦。參見廖德宗、郭吉清，〈高雄溫泉舊址考證及泉質探究〉，《高雄文獻》，9：1（高雄，2019.6），頁116-143。

旋的母國德意志關稅同盟。

三、在太平洋建立德意志殖民地

(一) 「誰」想殖民福爾摩沙

在馬洪離開臺灣後不久，1861年9月，艾倫波終於和大清帝國簽訂通商條約，保障德意志關稅同盟邦國享有和英、法等國在大清帝國的商業權利，普魯士特遣艦隊便自天津駛離，回程完成與暹羅簽約的任務後，1862年返抵德意志地區。普魯士特遣艦隊返國後，雖有前述維納船長與赫爾曼·馬洪在個人的回憶錄中展露對美麗之島的渴望，但普魯士與德意志關稅同盟並未再對遠東事務採取具體行動。

然而1865年6月起至隔年2月，《北德公共日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及《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突接連刊載了數篇「殖民福爾摩沙」的社論，⁶¹在這些社論中，貢獻最多的是地方政治家(Kommunalpolitiker)兼歷史學及地區研究學者恩斯特·弗立德。1867年，他甚至以「殖民福爾摩沙」為例，出版了《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建立普魯士——德意志殖民地——以東亞為中心》一書，書中大篇幅談論了福爾摩沙的殖民史，以及島上可供殖民者取用的豐富資源。⁶²

弗立德關於殖民福爾摩沙的論述成功在1860年代後半引起德意志地區的輿論關注，德語地理學雜誌《地球：富有插圖的地誌與民族學誌》(*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以下簡稱《地球》)1867年至1871年均有文章提及福爾摩沙在「前陣子」時常被提起，⁶³而輿論對於臺灣的關注也促

⁶¹ 史托克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頁79。

⁶²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hschafts-Politik*, pp. 8-62.

⁶³ Anonymous, “Expeditionen auf der Insel Formosa,” *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12 (1867), p. 366; Anonymous, “Zur Colonisation Formosas,” *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17: 14 (May, 1870), p. 217;

成了這段期間有更多關於臺灣的報導出現在報章雜誌中，例如英國自然科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1866年隨英國海軍船艦來臺踏查的報告、德意志醫生阿諾·薛特里西（Arnold Schetelig, 1835-1900）1867年在北臺灣的探險均先後被地理學雜誌《地球》、《一般地理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Erdkunde*）介紹刊登。⁶⁴

此輿論發酵的程度甚至引起遠在日本、時任普魯士駐日公使的巴蘭德注意。巴蘭德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1867年當殖民福爾摩沙的討論正熱烈的時候，他曾和普魯士海軍大將阿達貝爾特親王表達對此事的看法。他認為臺灣缺乏適合船隻停泊的良港，在氣候上也不適合歐洲移民居住，且殖民臺灣將耗費大量的人力及金錢，亦可能與大清帝國發生衝突，影響德商在華貿易，因此不宜將福爾摩沙作為德意志殖民地。⁶⁵

從民間——或稱德語知識圈——的輿論來看，1860年代的德意志地區確實如先行研究所言，對殖民福爾摩沙的話題興味盎然，然而，這似乎未對普魯士或其他關稅同盟邦國造成影響。前述巴蘭德雖曾向阿達貝爾特親王談論此事，但巴蘭德的回憶錄中並未提到後者對此的回應為何，而先行研究中應用最多德國官方檔案的史托克也未能透過檔案說明普魯士與關稅同盟殖民福爾摩沙輿論的回應如何。因此本文認為，將1860年代德語輿論圈殖民福爾摩沙的討論視為由下而上的單向呼籲，而非「德國」對福爾摩沙的野心，是較適當的說法。

Anonymous, "Deutschlands Interessen in Ostasien," *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18: 24 (January, 1871), p. 378.

⁶⁴ Anonymous, "Expeditionen auf der Insel Formosa," pp. 365-367; Anonymous, "Zur Colonisation Formosas," pp. 217-220; Ernst Friedel, "Bericht über Arnold Schetelig's Reise in Formosa,"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3 (1868), pp. 385-397.

⁶⁵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es und seiner Folgen*, pp. 141-146.

（二）福爾摩沙殖民論者的臺灣知識

1860 年代殖民福爾摩沙的論述中，弗立德的著作《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建立普魯士——德意志殖民地——以東亞為中心》向來被先行研究視為「德國」對臺野心的代表，然而這本書呈現了臺灣何種樣貌、當時的「德國」究竟對臺灣了解到什麼程度，竟想占領一個缺乏良港的島嶼作為遠東海軍基地——這是本文認為重要，但先行研究未曾解答的問題。因此以下將透過弗立德書中的臺灣書寫，探討 1860 年代德語臺灣知識的累積與對臺野心的關聯性。

《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建立普魯士——德意志殖民地——以東亞為中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福爾摩沙及其周邊島嶼，是書中最主要提及臺灣的部分，第二部分則從民族、法律、政治、經濟體系等面向說明如何建立一個普魯士／德意志的殖民地。而在第一部分中又細分為兩小部分。前半段介紹福爾摩沙被外來政權殖民的歷史，後半段則「從殖民需求的角度切入」，⁶⁶描述了福爾摩沙的地形、族群關係、港口與航道、氣候、礦藏、物產與動植物。

作為一個從未來臺，甚至未曾來到亞洲的德意志人，弗立德書中關於臺灣的介紹均仰賴他人的著作寫成。例如，關於福爾摩沙的殖民史，弗立德主要參考德意志地理學者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1830 年代的巨作《地學通論》（*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ss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oder allgemeine vergleichende Geographie, als sichere Grundlage des Studiums und Unterrichts in physikalischen und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亞洲篇寫成。⁶⁷若將李特爾的臺灣知識繼承往前推進，則可追溯到十九

⁶⁶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 22.

⁶⁷ Carl Ritter, *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ss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oder allgemeine vergleichende Geographie, als sichere Grundlage des Studiums und Unterrichts in physikalischen und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Theil 4, Buch 2, Asien, Band 3 (Berlin: G. Reimer, 1834), pp. 858-881.

世紀初期旅居法國、從未來過臺灣的德意志漢學家柯恆儒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乃至十八世紀初期來臺測量、替清廷繪製地圖的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⁶⁸而這類臺灣知識其實就是十七世紀起歐洲漢學傳統的一部分，透過傳教士翻譯漢文書籍，將地方志中的臺灣介紹給歐洲的讀者認識，並多次被不同書籍傳抄而長久流傳。

關於福爾摩沙的港口、氣候、天然資源與族群關係，弗立德大量引用了1860年代在臺擔任領事的郇和之著作。他摘譯1863年郇和在倫敦皇家亞洲學會發表的會議紀錄，⁶⁹以及正式刊載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的〈福爾摩沙島的筆記〉(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⁷⁰描寫淡水港的水深、與冬季多雨的氣候，並指出淡水南方不遠處的「通宵」(Tungschao) 也可能蘊藏煤油。⁷¹而郇和上山下海取得豐富的臺灣鳥類研究成果，也被羅列在福爾摩

⁶⁸ 在李特爾的描寫臺灣著作的註腳處，可發現柯恆儒1820年代的三篇著作〈福爾摩沙人的語言〉(Sur la Langue des indigènes de l'île de Formose)、〈描繪福爾摩沙〉(Description de Formose)、〈漢語文獻中的福爾摩沙〉(Description de l'île de Formose, extraite de livres Chinois)，以及馮秉正收錄於《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描寫臺灣的書信被大量引用。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Sur la Langue des indigènes de l'île de Formose," *Journal Asiatique*, 1 (October, 1822), pp. 193-202; "Description de Formose," *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de la géographie et de l'histoire*, 20 (1823), pp. 195-224; "Description de l'île de Formose, extraite de livres Chinois," in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vol. 1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6), pp. 321-374. 因筆者不諳法文，關於柯恆儒的著作整理與翻譯出自 Douglas Fix (compiled) & Amy Heneveld (summariz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French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s://reurl.cc/Dg9r2j> (2022/10/25).

⁶⁹ 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8 (February, 1864), pp. 23-28.

⁷⁰ 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4 (1864), pp. 6-18.

⁷¹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p. 23, 32-33, 37-38.

沙多樣的生物資源清單中。⁷²最後在臺灣島現狀的描述上，弗立德引用了史溫侯 1865 年〈福爾摩沙原住民的筆記〉（Notes on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一文，⁷³說明臺灣南部的原住民「魁儡番」（Kali）和附近的客家人處得不好，部落女子也常因為美貌而被漢人娶走，但過不久便會返回部落繼承家業。⁷⁴

除此之外，弗立德也參考了前述「易北河號」的維納船長以及農業學者赫爾曼對臺灣的書寫。維納船長與赫爾曼的著作雖不能作為「德國」對臺野心的證明，但在 1860 年代中葉殖民福爾摩沙的輿論中成為了知識的提供者。

「德國」在亞洲的勢力布局於 1860 年代才正式跨出第一步，對大清帝國邊疆島嶼的認識勢必也不深，因此若要得知臺灣的消息，長久以來皆須依靠在亞洲商業布局與政治勢力發展較早的英、法、俄、美等國相關著作——弗立德寫作這本殖民福爾摩沙專書的知識取得管道也依循此途徑。然而，儘管他的著作已是當時德語世界中相對完整的福爾摩沙書寫，仰賴他國作為消息來源仍存在資訊完整度與深度不足、正確性有待檢驗的問題。例如弗立德曾在書中引用了十七世紀西班牙多明會傳教士阿度阿爾特（Diego Aduarte, 1569-1636）、十八世紀馮秉正與貝紐夫斯基（Maurice August Benyowsky, 1746-1786）、十九世紀李特爾等人的著作，將臺灣的氣候描寫得溫和宜人；⁷⁵在面對歐洲人可能在熱帶遇到疾病如瘧

⁷²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p. 50-51.

⁷³ 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in *Report of the Thirty-Fifth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Birmingham in September 1865*, ed.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66), pp. 129-30.

⁷⁴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p. 53-54.

⁷⁵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 33.

疾、痢疾等問題時，稱福爾摩沙的氣候有助於治癒所有熱帶疾病。⁷⁶而站在積極倡議普魯士領導德意志建立海外殖民地的立場，弗立德似乎篩選掉了對於臺灣氣候與環境負面的描述，忽略馬洪曾在其回憶錄提到臺灣的天氣炎熱，會使人中暑，⁷⁷以及馮秉正曾提及臺灣的水會致死的說法。⁷⁸在缺乏對臺認識的情況下，弗立德雖成功引起輿論注意，卻未能說服普魯士及關稅同盟採取行動，似乎也是可預期的結果。

四、變動中的德意志

先行研究認為「德國」在經歷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自然欲向海外擴張，因此先有普魯士特遣艦隊的亞洲行，再有殖民福爾摩沙的討論；甚至也有研究者認為殖民福爾摩沙的意圖早在特遣艦隊東來時已開始醞釀。然而，這類以馬克思帝國主義發展理論作為研究框架的說法，未曾注意到 1859 年至 1862 年普魯士特遣艦隊的亞洲行與 1865 年至 1867 年「殖民福爾摩沙」的輿論其實存在約三年的時間差。意即，若如先行研究所言，「德國」欲發展帝國主義，且普魯士特遣艦隊與殖民福爾摩沙討論為「德國」實踐帝國主義的作為，為何殖民福爾摩沙的輿論不是發生在特遣艦隊東來前後，而是晚了數年才開始？

依據本文的分析已可見普魯士特遣艦隊成員的臺灣經驗，與 1865 年開始的「殖民福爾摩沙」討論實是因果關係微弱的兩件事情。但若 1860 年代普魯士與德意志關稅同盟對殖民臺灣態度保留、未有具體作為，而民間支持殖民論者對臺也缺乏深刻的認識，為何在 1865 年至 1867 年間「殖民福爾摩沙」的議題卻仍引起眾多關注呢？本文認為，回到 1860 年代弗立德書寫社論與專書的

⁷⁶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 36.

⁷⁷ Hermann Maro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p. 31.

⁷⁸ 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頁44。

時空背景，或許可以替「德國」殖民福爾摩沙的野心提出一個更貼切的歷史解釋。

十九世紀初期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經歷秩序重整，其中，德意志邦聯（der Deutsche Bund, 1815-1866）取代了原本的神聖羅馬帝國，並以北部的普魯士及南部的奧地利兩強鼎立。1850 年代起，普魯士在經歷歐洲革命之後，雖在政治上由保守派統治，經濟卻快速發展，並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取代了因為擁有大片農業區、疲於應付龐大領土動亂而經濟停滯、國力衰弱的奧地利，在德意志邦聯內取得難以撼動的領導地位。然而除了對外與奧地利競逐德意志的領導權外，1860 年代普魯士同時也在德意志地區擴張自己的版圖。

1864 年，德意志邦聯與丹麥王國為爭奪位於交界處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地區主權，爆發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普魯士與奧地利聯合出兵進駐該地，打退了丹麥的軍隊後，共同接管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地區。⁷⁹然而，由於普魯士與奧地利對於該地的統治無法達成共識，遂又於 1866 年爆發普奧戰爭。普魯士獲勝，贏得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統治權，其領地自此往北延伸到丹麥邊境，並獲得基爾（Kiel）、弗倫斯堡（Flensburg）等港口，以及被波羅的海與北海包圍的大片領土。此外，在這場普、奧對峙的戰爭中，雙方分別尋求德意志邦聯的其他邦國支持；其中，與奧地利結盟的漢諾威（Königreich Hannover）、黑森——卡塞爾（Hessen-Kassel）、拿騷（Nassau）、法蘭克福自由市（Freie Stadt Frankfurt）等邦國則在這場戰爭中被普魯士併吞。⁸⁰也就是說，在經歷 1860 年代的兩場

⁷⁹ 臺灣一般對於「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的稱呼為「普丹戰爭」，而在德國則稱其為「德意志——丹麥戰爭」（Deutsch-Dänischer Krieg），其中的德意志所指為德意志邦聯。本研究不以常見的「普丹戰爭」稱呼，原因在於出兵的除了普魯士以外還有奧地利；而若使用「德意志——丹麥戰爭」則擔心會有指該「德意志」為當今德國的誤解，因而選用「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稱之。

⁸⁰ 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 189-190。

戰爭後，普魯士的領土一下子往北、往南擴張了許多。同時，1866年的普奧戰爭也終結了自拿破崙戰後成立的德意志邦聯，普魯士另起爐灶，領導北方的邦國成立「北德意志邦聯」（Norddeutscher Bund），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前身。

針對1860年代普魯士不斷擴張自己在德意志地區的勢力，甚至是實質的領地，最終促成了1871年德意志帝國「統一」的過程，有學者指出：

發生在一八七一年的「統一」與其說是正處於萌芽狀態的德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或者意志的表現，倒不如說是普魯士實行擴張主義、對德國的非普魯士地區實行殖民化、並與被排斥在外的奧地利競爭的一種形式。⁸¹

因此從歷史發展來看，對於1860年代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德意志邦國而言——尤其是具領導地位的普魯士與奧地利——最重要的其實是藉由擴張與結盟鞏固自身的地位，前人研究所言海外帝國主義的擴張，在此時對於普魯士或奧地利官方應非重要的對外政策。

在上述普魯士擴張主義的時代背景中分析弗立德的著作將會有不同的發現。首先，弗立德在序言及導言中均提到1864年的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1866年的普奧戰爭使普魯士獲得了大片濱海的領土，包含北方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西部的漢諾威與東菲士蘭地區（Ostfriesland），港口則有面向波羅的海的基爾港和面對北海的埃姆登港（Emden）等，這些濱海領地所能提供的航海資源，如優良的港口、造船技術與船員，有助於海外殖民地的發展。⁸²而弗立德對於德意志海外殖民地的想像，則是由普魯士所主導：

⁸¹ 瑪麗·富布盧克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頁187。

⁸²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p. IV, 5.

來自不同職業與黨派的要求皆顯示，由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殖民運動（deutsche Colonisation unter preussischer Führung）所能帶來的利益，是有發展性的，並且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現在，那些使普魯士與德意志地區統一、使普魯士成為歐洲第一經濟強權的地區，再次追問著殖民的問題，而且這次難以視而不見。⁸³

弗立德在導言中也開宗明義講到：

在介紹這本以「建立普魯士—德意志貿易、耕種、佔領的殖民地」為題的著作前，我們必須先回顧布蘭登堡—普魯士先前在殖民政策上的偉大成就，作為未來成為海上強權的借鑑……。⁸⁴

接著弗立德描述了自 1661 年起布蘭登堡——普魯士一系列在非洲海岸殖民、與東印度地區貿易的歷史。⁸⁵

1860 年代的德意志地區仍是邦國林立，各方對於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想像也因為傾向普魯士或奧地利而尚未達成共識。但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弗立德作為在柏林成長的普魯士人，在論述德意志的海外殖民行動時，其實是從普魯士的角度出發；而他的殖民政策也是建立在普魯士併吞了北方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西部的漢諾威與東菲士蘭地區，獲得了大片濱海的領土與港口的前提下。因此，與其說 1865 年至 1867 年德語輿論圈「殖民福爾摩沙」的討論是肇因於「德國」帝國主義的發展，更貼合歷史

⁸³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 22.

⁸⁴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 1. 布蘭登堡——普魯士（Brandenburg-Preussen）是普魯士王國的前身。

⁸⁵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p. 1-5.

現場的解釋應為：在普魯士於德意志地區擴張勢力的背景下，一些普魯士擴張主義者認為可藉由取得海外殖民地鞏固普魯士的領導地位，進而看上了曾被「馬來人、漢人、滿洲韃靼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波蘭與俄羅斯、美國人、法國人」殖民或覬覦的臺灣。⁸⁶

五、小結

本文透過重探1860年代「德國」「殖民福爾摩沙」輿論的相關著作之內涵與成書脈絡，以社會史、知識史的角度切入，嘗試與臺灣涉外關係史的先行研究對話，主張1860年代中葉「德國」雖因境內的政治局勢變遷而出現「殖民福爾摩沙」的討論，但整體來看，無論是曾經來臺的普魯士特遣艦隊或是普魯士與德意志關稅同盟官方，均沒有殖民臺灣的明確意圖與實際作為。因為相較於太平洋上的遙遠小島，1860年代的「德國」更關注的其實是帝國統合的問題。

長久以來臺灣涉外關係史之所以將「德國」列為覬覦福爾摩沙的列強之一，一方面是受到語言限制，無法直接、完整、仔細地解讀相關的德語史料，須依賴英語與日語研究的轉譯與轉錄；另一方面則受到傳統馬克思帝國主義發展理論的理論框架所影響，認為物產豐饒且蘊藏煤礦的「美麗之島」理所當然成為積極向外擴張勢力的歐美帝國的目標。然而，如同本文所指出的，過度強調經濟面向容易使人忘記歐洲內部的政治與社會變化同樣也是影響帝國向海外擴張的重要因素。若從歐洲政治發展的角度看待1860年代「德國」對福爾摩沙的野心，便會看到截然不同的歷史樣貌，發現臺灣竟曾是德意志帝國統合進程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從更大的視野來看，當研究十九世紀臺灣與西方的交涉時，除了關注臺灣與挾帶近代武力的西方帝國主義本身，尚須

⁸⁶ Ernst Friedel,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p. 8.

注意歐美內部的政治局勢變化及各國的歷史發展，將臺灣重新放回世界史中，方能對十九世紀西方各國、西方人眼中的臺灣有更貼合歷史現場的認識。

(責任編輯：江趙展 校對：李心平)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一) 雜誌與期刊

- Anonymous. "Deutschlands Interessen in Ostasien." *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18: 24 (January, 1871), pp. 377-379.
- Anonymous. "Expeditionen auf der Insel Formosa." *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12 (1867), pp. 365-367.
- Anonymous. "Zur Colonisation Formosas." *Globus: illustri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17: 14 (May, 1870), pp. 217-220.
- Bowring, J. C. "The Rice-Paper Plant of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art III 1851-52 (1853), pp. 28-33.
- Friedel, Ernst. "Bericht über Arnold Schetelig's Reise in Formosa."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3 (1868), pp. 385-397.
- Richthofen, Ferdinand Freiherrn von. "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geologischen Gesellschaft*, 12: 4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1860), pp. 532-545.
- Swinhoe, Robert.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2 (May, 1859), pp. 145-164.
- Swinhoe, Robert.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8 (February, 1864), pp. 23-28.
- Swinhoe, Robert.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4 (1864), pp. 6-18.

(二) 專著與檔案

- 李斯 (Ludwig Riess) 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 達飛聲 (James W. Davidson) 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

- Anonymou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Band 3.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1873.
- Anonymou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with illustration.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 Brandt, Max von.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es und seiner Folgen*. Stuttgart: Strecker & Moser, 1897.
- Friedel, Ernst. *Die Gründung preußisch-deutscher Colonien im Indischen und Großen Ocea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östliche Asien: eine Studie im Gebiete der Handels- und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Albert Eichhoff, 1867.
- Habersham, Alexander Wyly. *The North Pacific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expedition; or, my last cruise. Where we went and what we saw: being an account of visits to the Malay and Loo-Choo Islands, the coasts of China, Formosa, Japan, Kamtschatka, Siberia, and the mouth of the Amoor River*.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London: Trübner & Co., 1857.
- Hawks, Francis L.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notes and journals of Commodore Perry and his officers, at his request, and under his supervision*, vol. 1.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 Maron, Hermann. *Japan und China: Reiseskizzen entworfen während der Preußischen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von dem Mitgliede derselben*, Band 2. Berlin: Otto Janke, 1863.

- Martens, Karl Eduard von.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Zoologischer Teil*, Band 1, Allgemeines und Wirbelthiere.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1876.
- Ritter, Carl. *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ss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oder allgemeine vergleichende Geographie, als sichere Grundlage des Studiums und Unterrichts in physikalischen und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Theil 4, Buch 2, Asien, Band 3. Berlin: G. Reimer, 1834.
- Swinhoe, Robert. "Notes on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In *Report of the Thirty-Fifth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Birmingham in September 1865*, edited by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pp. 129-130.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66.
- Werner, Reinhold.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von Reinhold Werner, Lieutenant zur See I. Klasse*, Theil 2.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63.
- Wirth, Albrecht. *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 Bonn: Carl Geogri, Universität-Buchdruckerei, 1898.

二、近人專書

史托克 (Helmut Stoecker) 著，喬松譯，《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勞倫斯·桑德豪斯 (Lawrence Sondhaus) 著，NAVAL+譯，《德國海軍的崛起：走向海上霸權》，北京：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2013。

瑪麗·富布盧克 (Mary Fulbrook) 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臺北：左岸文化，2005。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完整版）》，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

Eberstein, Bernd. *Preussen und China: Eine Geschichte schwieriger Beziehungen.* Berlin: Duncker & Humboldt, 2007.

Gründer, Hors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 Paderborn; München; Wien; Zürich: Schöningh, 1985.

三、近人論文

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文獻專刊》，1：1，臺北，1949.8，頁 28-53。

余文堂，〈19 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國史館館刊》，58，臺北，2018.12，頁 1-68。

余文堂，〈鴉片戰爭後的中德貿易（1842-1860）〉，《興大歷史學報》，2，臺中，1992.3，頁 83-120。

李國祁，〈三國干涉還遼後中德租借港灣的治商與德璀璨（G. Detring）上德政府建議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臺北，1969.8，頁 83-112。

黃順進，〈1860 年代的德意志與臺灣：從覬覦臺灣到侵墾大南澳的探討〉，《宜蘭文獻》，110，宜蘭，2017.6，頁 4-55。

黃福得，〈1918 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5，臺北，2006.5，頁 117-145。

廖德宗、郭吉清，〈高雄溫泉舊址考證及泉質探究〉，《高雄文獻》，9：1，高雄，2019.6，頁 116-143。

劉湘瑤、王國雄，〈以蓬草發現史看博物學的探究歷程與知識發展特性〉，《科學教育月刊》，382，臺北，2015.9，頁 19-31。

四、網路資料

Fix, Douglas (compiled) & Amy Heneveld (summariz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French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s://reurl.cc/Dg9r2j> (2022/10/25)

Revisiting German Colonial Ambitions for Formosa in the 1860s

Yi-chen Hsieh*

Abstract

Based mainly on two pieces of evidence, it is sometimes asserted that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had colonial designs on Taiwan. The first piece of evidence centers on discussions by some German speakers in the 1860s to turn Formosa, as Taiwan is referred to in these discussions, into a German colony. The second comes from the Da-Nan-Ao Incident (大南澳事件) of the 1860s, in which the German James Milich, working in concert with the British national James Horns, attempted to turn Nan-Ao in north-eastern Taiwan into a navy harbor, to be operated by the Germans. At the time, however, the various German states were busy with the project of German unification; they also lacked any history of lengthy engagement with East Asia. Why they would suddenly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aiwan, and why they would want to occupy a harbor too small to be of much military value are matters left unaddressed by traditional Marxist accounts of the period.

This paper challenges previous scholarship and argues that Germany never had any real intention of turning Formosa into a German colony. It claims that the project of German unification wa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Those who did advocate occupying Formosa were supporters of Prussian Expansionism. They believed that if they could portray Prussia as being in favor of colonization, they would strengthen Prussia's position vis-à-vis Austria in the German Federation. But their call to colonize Taiwan was posturing on their part, not meant to be taken seriously.

Keywords: Germany, Imperialism, Taiwan's Foreign Relations, Prussian Expedition to the Far East

*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